

林
庚著

中国文学简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7209
43
1

林庚著

中国文学简史

(先秦至唐代)

中国文学简史（先秦至唐代）

林 庚 著

责任编辑：陆彬良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190千字

1988年9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1—800册

ISBN 7-301-00298-X/I·067



作者近照（于北京大学燕南园寓所）

桑祥森摄



作者1959年照（于北京）

杜牧的出現在晚唐頗有些像李益之出現在中唐。中唐時歌律詩流行，而李益独以七絕聞名；晚唐時詩，詩壇普遍趨於內向，而杜牧却以風格爽朗的七絕一振暗代的耳目。絕句是在盛唐詩歌高潮中才登上詩壇，大顯身手的，七絕就尤其是最活躍的詩體了。特別具有深入淺出、自然流露的特色，在各種詩法中七絕因此也最富於新鮮的生命力。這正是要看此古宋代，在整個詩壇漸趨於老化的情形下，七絕却還不失其活潑新鮮的本色，產生了不少^{滿口}流心的佳作就可知了。李益和杜牧是它出現在詩歌高潮趨于衰落的^正中晚唐時期，^正都是通過七絕只再現了盛唐的遺音。杜牧的一些絕句，如《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鑒說認前朝；
東風不与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過華清宮》：

新丰綠樹郁黃埃，數騎漁陽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

《將赴吳興登東遊亭一絕》：

作者手迹

导 言

中国文学史的内容。 古典文学在祖国文化中的位置。

诗的国度。民间文学在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伟大作品中所体现的：时代的脉搏、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平的愿望，对于祖国历史、河山与乡土的爱恋，对于内外压迫者的反抗，对于斗争中优良品质的礼赞。

历代作家所属的“士”的阶层。 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历史作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文学传统。 从寒士文学到市民文学的历史发展。

中国语言文字上的特点与中国文学。 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藏。

公元前十几世纪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就已经有了高度的文化，那时曾流行着许多短歌与神话故事，散文已经初步用作历史的记载，而且也出现了一些类似史诗的篇章。从那时候起，中国就正在进入初期的封建社会。三千多年来，历史不断地演进着，文学反映着每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歌唱着广大人民生活中的理想与痛苦，成为这民族文化中最丰富的宝藏。今天我们骄傲于祖国三千年来悠久的历史，对于过去如何实践着的文学道路，如何形成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如何在作品上具体的创造了光辉的成就，这些讲述就是一部中

国文学史主要的内容。

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中，文学作品是保存得最完备的部分。例如音乐，古代曾经是十分发达的，但是我们今天已很难得到古代的乐谱，就是唐代舞乐的盛况我们今天也只能从文学的记载中来了解它。再如图画，我们今天能看见宋代的画已很难得，更早些的作品几乎都只能是仅仅见诸记载了。只有文学作品，三千多年来就大部分被完好的保存着，像古代《国风》里那么早的民歌，今天我們都可以一字一句直接地亲切地读到它，这样对于祖国古代的文化就能有一个更丰富、更具体的体会。同时中国传统上原是一个诗的国度。

“诗”居于“六经”之首，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诗的了解是不可缺少的。至于在艺术范围内，如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古典的画上往往也要题上几行诗句；要了解中国的画，也非了解中国的诗不可。这些自然也就使得整个古典文学在祖国文化的各方面都更居于首要的位置。

三千年来文学史上的发展，又具体地说明了民间文学所起的作用。例如《诗经》里的《国风》这些来自民间的歌唱，就使得四言诗从艰深的《雅颂》中获得了解放。再如两汉乐府之发展了五言诗，敦煌曲子词之发展了唐五代的词，这些在文学史上都是历历可数的。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它所反映的时代生活，乃是这一时代最核心的动态。例如《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封建制度的行将崩溃，那正是一个时代的动向；《国风》里所反映的封建庄园时代的发展情况，汉魏乐府中所反映的游子离乡背井的生活，都莫非时代的精神面貌。文学作品正以能反映时代的脉

搏而成为伟大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其中所歌唱的思想感情，也必然表现着广大人民的愿望。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乃普遍地为人民所喜爱。屈原的《离骚》冲破了宫廷的黑暗就唤起了历代人民的景仰。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痛骂那些墨守礼教、剥削人民的家伙们，就成为著名的篇章。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历来就因其不是虚伪的、屈从的；而是真实的，解放的，从而形成一个宝贵的精神力量。如果说其中含有着痛苦的伤痕，那也是勇敢的、骄傲的伤痕。我们骄傲于这些作品，热爱这些作品，正如同我们对于祖国的骄傲与热爱一样。而中国古代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乃是与和平的愿望分不开的。例如陈陶《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这是何等勇敢悲壮的作品，可是这首诗里又多么鲜明的说出和平的愿望。这样一首诗对于正义的战争就将加强敌忾同仇的决心；对于侵略性的战争就将唤起反对战争的觉悟。再如李颀《古从军行》：“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前两句说战斗既然还没有取得胜利，就该舍身为国效忠；后两句说如果战争所得到的并不是和平而只是为封建帝王们掠夺到了葡萄，那才是毫无意义呢！这样的歌唱正是和平愿望与爱国主义最具体的表现。再如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被誉为唐人最好的绝句之一，我们一读起来，就唤起浓厚的历史感情。这感情也表现为对于祖国乡土的爱恋。中国古典诗歌中恋歌较少，而山水诗却特别发达，这些山水诗篇除了少数

吟风弄月，故作雕饰的作品之外，往往是一种朴素的乡土感情。这里有一个故事：南朝陈伯之原是齐的将军，齐亡于梁后，他恐怕为梁所不容，便投到北魏去；梁丘迟写信给他劝他还是回到祖国来，其中最有名的有几句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悵？”陈伯之读了这信，想起自己的乡土，果然就带了军队回到祖国来。至于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祖国的河山，一草一木正无一不是乡土的感情了。这与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乃正是从来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不屈从的代表性人物，最早有伯夷、叔齐，他兄弟二人在商亡后，宁可饿死不食周粟，这坚定刚强的性格就成为后来传统的景慕。发挥这一个品格到了周末就有屈原。屈原有一篇《橘颂》，是礼赞橘树坚定品格的。他说橘树生于南国就绝不离开祖国，最后并引伯夷、叔齐的故事，说“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屈原一生与腐败的政治作斗争，因为无力挽回祖国的厄运，最后便投水而死。屈原的这一发挥，影响更大。之后司马迁又为伯夷作传，使得一个坚定的有斗争性的品格，更普遍的成为历代优良的传统。中国广大人民在长期封建统治之下，体验到帝王所需要的往往不过是爪牙与奴隶，天下的宫廷十九是腐败的、昏暗的；因此常要求自己有一付硬骨头，有一个坚定的不低头于帝王与统治阶级之前的品格。左思诗里所说的：“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而左思这一种品格最形象的表现，就形成那“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名句。这也就是中国

诗歌上传统所礼赞的“风骨”。

中国古代的作家大都属于“士”这一阶层。“士”多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身分寒微，生活困苦，也即我们所通称的“寒士”，杜甫诗“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指的这一个阶层了。他们出身于农村，流浪在都市，宋玉《九辩》里所说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正是代表了这一阶层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之中也有属于“大夫”这一阶层的，这就是阮籍《大人先生传》里所讽刺的对象。“士”与“大夫”是显然有别的，例如《国风》因是最富于代表性的民歌，其中便多见“士”的活跃；而“大夫”则是要出现于宫廷的。《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大夫与庶人显然是居于不同的地位。而“士”呢？孟子说：“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士”与“庶人”却正是相提并论的。按《礼记》说：“下士食禄九人，”又说：“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所以“士”与“庶人”在经济地位上也是相去无几的。《论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匹夫”又称“匹士”、“匹庶”。中国优良的富于民主性的传统，所以一向就看得起这同于庶人的“士”，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士”的品格是要求得很高的。至于“大夫”呢，那似乎谈不上什么品格。民间诗人罗隐的《小松诗》所以说“陵迁谷变须高节，莫遣人间做大夫！”中国古典的优秀作家，正是传统的站在与封建权贵势力对立的一面。他们虽然不可避免的要受到那时代一定的局限，然而正像一个巨人之站立在时代现实的土壤上，他毕竟是高出于那个土壤的；他的高出

也就是那时代的民主精华的体现。

在三千年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经济基础既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变更，人们的理想便自然地集中于争取开明政治，因为只有通过开明的政治才能限制剥削的过分残酷，才能保证生产力的上升发展。可是这开明的政治怎样能够得到呢？那就要向代表广大人民的“士”的阶层开放政权。这也就是封建时代所能实现的民主了。墨子的主张“尚贤”，反对使用帝王周围的亲信；屈原的主张“举贤授能”，反对包办政治的“党人”，都是这同一个斗争的表现。开明的政治，自然绝不能依靠在帝王们面前甘作顺臣或爪牙的那些人。孟子所以说：“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这“不召之臣”，其实也就是一种民主斗争的方式；例如嵇康不肯为司马昭所御用，这“不召之臣”就威胁了司马昭的政权，而嵇康临刑的时候顾日影弹琴就义，死得何等骄傲从容，当时有三千大学生集体为他请愿，要求做他的学生；他一方面由于威胁了统治者的政权而被迫害，一方面却那样的赢得普遍的崇敬和热爱，这就是尖锐的民主斗争的方式。当然在这斗争中，农民并不是袖手旁观的，军事乃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到了民主斗争在政治上无法开展时，农民就往往要用军事把斗争带到最高形式去，那就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这规律是无数次被证明了的。而在还没有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可以取代封建制度的时候，农民起义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最后又还只能是封建社会的开明政治。“士”的民主斗争所以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也就是说是有力量的。在长期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正是这样满怀信心，为自己的愿望与理想而斗争着，因此所创造

的文化永远不该是阴暗的、低沉的、无望的呻吟；相反的，乃是鲜明的、开朗的、富于生命的高歌；它永远是光辉的、健康的、为世世代代所骄傲的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其初期与后期的不同，上升阶段与没落阶段的不同。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主要是代表着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文学，也就是以士为代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寒士文学。随着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正统文学也就日趋老化，这里正是一个历史的分界线，这样，宋元以来，新兴的市民文学乃日益兴旺起来，而越来越居于创作上的主要地位。这寒士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的盛衰交替，也便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鲜明的一个重大变化。自周民族以农立国以来，西周时代似乎是接近于一种封建领主的农奴制。当然在初期的封建社会中，免不了还有许多奴隶制的残余。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统一，农奴制又逐渐解体，进一步发展成为地主佃农制，形成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统一封建社会。国家高度的中央集权，根本性的生产资料——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城市成为政治、文化的中心。这些都具有某些商业资本的因素。这样，随着两汉以至唐代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这时市民文学便逐渐应运而生，宋元以来乃以小说、戏剧做为它中心的舞台，以故事的爱好，展开了全新的创作。当然，正统诗文中也并非没有故事的爱好，但往往是通过典故来满足这一要求。如李商隐最长于用典，他的作品中也就最富于故事性。像“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这些富于故事性的用典，在诗人们的笔下，广泛地

取材于神话、寓言、史传、笔记、民间传说等许多方面。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在杜牧这首诗里，“赤壁之战”故事的影子已宛然跃于纸上了。这种故事的爱好到了市民文学中就充分地通过人物情节的抒写尽情地发展起来。丰富的社会内容、复杂的世态人情、爱情故事与英雄传奇等生动的主题，便在正统文学集中于政治兴寄的主题以外，展开了文学创作的新天地。同时，宋元以来，也已出现了古白话，而唐以后的正统诗文却离开口语越来越远。以诗歌而论，此后的作品比起唐诗来反而要显得更艰深难懂。市民文学在这方面则正是得天独厚，因而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也吸引着众多的作家参加了这个创作行列，终于蔚为大观，占据了中国文学史后期的重要篇幅。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是凭藉着文字而获得广泛的流传。中国的文字一直是沿着象形会意的路线发展着，它可以不受各地方言的影响，因此南北方言差距如此之远，却都能通过同一文字统一为一个融合无间的民族大家庭。我们现在看到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卜辞；其中一个字有的还有三四十种写法，这说明当时每一个字由创造到成熟都要经过繁难的过程；这样的文字就只好一面不断的创造，一面尽所已有的先行使用；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文字的数量是远远够不上使用的。中国古代有“结绳记事”的传说，换句话说那就只是一个代替语言的简单符号，而并非完全等于语言，中国文字最初的使用情形可能正类似这样；例如一句话本来要用十个字才可以写下来，可是手里没有十个字，便只好重点的灵活的运用那已掌握了较少的字，来表现这句话；这种

情况就好像后来我们打电报上常用的语言一样，乃是更为经济的。打电报所以如此，自然是为了节省电费，而古人最初之所以如此，却是为了需要节省文字。

当然文字与语言是相互影响的，语言受了文字这样经济表现的影响，就逐渐吸取了其中的优点而变为更灵活更富于变化的语言。文字在数量逐渐的增加中，也必然就要求成为更能完全写出语言的文字，这样“文”“言”的分离原不过是古代暂时的现象。然而文字在最初的时候虽为人民集体所创造，最后却掌握在王官手里，因为那时只有王官有机会逐渐总结这样一个集体的收获，最早的许多书籍往往便是通过他们写出的；再加以历代统治阶级每要饰智惊愚，故作典雅，使得文语与口语上的差别，就变成了一种人为的矫饰；可是在文学的发展上，却从来是要求它的“文语”和“口语”接近的，每次文坛上的解放，同时也往往正是语言文字上的解放。这正如普希金曾经说过：“俗语曾经是必须和文语分开的，但后来两者接近起来，而这就给了我们表达我们思想的巨大力量。”

中国由于语言文字的特点，使得文学语言从一开始就是世界上最经济、最灵活、最富于变化的语言，这些特点便自然地也就更适宜于诗歌的发展，中国文学的发展乃以诗歌为主流形成了它的传统。语言文字是文学所藉以表现的工具，而工具是决定产品形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欧洲曾因为产生了油性颜料，就使得油画成为西洋绘画中最主要的一种形式；而中国因为用优良的毛笔直接作画，就走上中国画所特有的与书法相通的道路，最后并发展到不用颜料的水墨画形式。至

于文学与它的语言的关系也同样的就决定了它的形式；例如欧洲的语言有明确的轻重音，因此就产生了欧洲诗歌“音步”的形式，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就产生了中国诗歌所特有的“几言”的形式。再如中国语言有明确的四声平仄，因此又产生了律诗及填词等。文学上各种的形式当然不完全都是语言上的问题，例如中国古代诗歌中，何以山水诗那么活跃？古代戏曲中何以话剧不发达？又何以多半以喜剧的形式出现？这些都还需要其它的解释，但语言既是文学作品上不可缺少的凭藉，我们对于它在文学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自应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至于语言丰富的艺术性能，则又是在生活的感受中不断获得滋润和发展的，是生活赋与语言以艺术的生命，这就更不单纯是个语言的问题，而正是文学史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诗歌是最精炼的语言艺术，它需要从日常的生活语言中不断地进行诗化。诗坛的繁荣，乃是建立在这语言充分诗化的普遍基础上，而不在于偶然出现一两位杰出的诗人，屈原的空前绝后与“楚辞”的阒野无人，恰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语言诗化的过程包括着形式、语法、词汇等各个环节的相互促进，使语言更富于飞跃性、交织性、萌发性，自由翱翔于形象的太空。从先秦全新的散文时代到唐代诗歌高潮的出现，正是沿着这一诗化的道路发展着，其间经历了楚辞与五、七言诗的演进，诗赋的消长，山水诗与近体诗的出现，语言的深入浅出、归真返朴等系列的曲折变化和发展，这也便是中国成为诗的国度的全部历程。

清理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主要是以爱国主义的精

神，追溯历代文学上的精华，以其中的成败为借鉴，以满怀信心的乐观精神，推陈出新，为探索我们新一代的文学铺平道路。那古典文学中留给我们的太阳般明朗的形象，那曾经启发我们的美学上的新鲜感受，都必然会促进我们今天文学创作上的发展与解放；历史是过去的事迹，却意味着未来的明天，三千年来古典文学中优秀的成就，正是为这美丽的明天准备着丰富的宝藏。